

文目对照全译

五四
經書

大系

天津古籍出版社

(文白对照全译)

四書五經大系

第一卷

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者的话

《四书五经》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著作，更是中国历史文化古籍中的宝典。它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部书及《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五部书。为使广大读者较多地了解儒家经典，我们又增编了《穀梁传》、《公羊传》、《孝经》、《周礼》、《仪礼》五部书目，谓之《四书五经大系》。我国从隋朝兴起的科举制度，试卷的命题必出自这些书目。为此，在封建时代，它是士大夫谋求官职和确立政治地位的钦定教科书和指导人们思想行动的经典。由于“儒家经典”所包含的内容极其广泛、深刻，因此，它在世界文化史、思想史上也具有极高的地位。西方学者甚至将儒家思想，与基督教思想、伊斯兰教思想、佛教思想并称为世界四大思想瑰宝。新中国成立后，乃至改革开放以来，儒家思想仍然在社会规范、人际交流、社会文化等诸方面，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不少专家、学者称它们为人类生活中的一部活哲学。世界经济管理大师们称“儒家经典”是“现代管理的圣经”。可见，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我们都应该在更新、更广泛的领域里，重新认识该书，积极借鉴其价值，重新认识我国的传统文化。

在译校工作中，除对原文进行认真校对外，在注释方面，参阅了大量的古籍，借鉴了有关的同类资料；在译文方面，基本上采用对译的方法。

然而，古代语言和现代语言存在着很大差异，何况古书今译本身也是一项学术工作，观点和译意难尽一致，尽管译注者、审校者、编辑者做了很大努力，终究因水平有限，书中不当之处，乃至谬误在所难免，尚请读者和专家指正，以便再版时得到改正。

一九九八年十月八日

总 序

《四书五经大系》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特别自汉朝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进一步确立了它在思想领域中的统治地位。它不仅对我国封建社会的巩固、发展和延续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深深地渗透于我国的政治、经济、哲学、文学、史学、艺术、民俗等文化思想领域，规定了我国古代文化的特质，塑造了华夏民族的基本精神面貌，这些特质和面貌迄今还积淀在不少人的深层意识之中。因此，认真清理和研究儒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仍然是我们思想文化方面的重要课题之一。其中，对儒家经典著作的整理、研究和介绍，理所当然地也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

两千多年来，宣扬和阐述儒家思想的典籍浩如烟海。据清代《四库全书总目》著录达 1773 部、20427 卷。从我国古代社会发展全过程看，《四书五经》是其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著作。“四书”是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是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和《左传》。它们构成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儒学的基本教材。

该儒学体系的形成经过了漫长的历程，是封建统治者及其知识阶层为适应其统治的需要不断实践，从实践到理论对若干典籍进行筛选的结果。

现在能见到我国最早的教材科目，大约是春秋中叶楚国大夫申叔时（公元前 613—591 年）论教育太子时提到的。申叔时说：“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之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国语·楚语上》）这里所说的“春秋”，是当时史官所写的以惩恶劝善为宗旨的史书；“世”，是先王的世系；“诗”，是流传于民间也利用于宫廷的诗歌；“礼”，是礼仪、制度之类；“乐”，即音乐；“令”，是先王之官法、时令；“语”，是治国的善言；“故志”，是以记前世盛衰成败为主的史书；“训典”，大约是先王的重要讲话记录。这九个方面，虽然说是为培养太子而教，却反映了两个重要问题：第一，全面施教的思想；第二，我国古代教育科目及取向，已初步形成。

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及创立者。在宣扬和传播自己思想的过程中，确定了一套教育科目，形成了自己的教材系统。他自己研究《诗》、《书》、《礼》、《乐》、《易》、《春秋》，并将其作为教学的根据。这里的《诗》，已经不是申叔时所论及的一般意义上的“诗”，这个《诗》已是经孔子整理过的古代诗歌总集。这里《书》指《尚书》，是古代历史资料汇编，孔子曾引用它教育学生，据说也经孔子整理过，其主要来源，推测来自申叔时所说的“令”、“训典”等文献。《礼》不知当时是否有书，但孔子讲授《礼》确可肯定。记载他讲授的礼，即现今流传的《仪礼》。《乐》是乐谱，早已失传。《易》即《周易》，孔子时只有《卦辞》和《爻辞》用作占筮。《春秋》即是鲁国当时的国史。这些书目，各自为用。据《礼记·经解》载：“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净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而诸教共施于一人，反映了孔子造就他理想中的全面发展的儒者追求。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规定的自我实践的四步曲。无论在哪一个层次上，《诗》、《书》、《礼》、《乐》、《易》、《春秋》的教义都贯穿其中。因此，尽管后世儒学规定的经典名目和阐述的要点有所变化，其指导思想和选择重点，却始终不变。

“五经”是对“六经”淘汰的结果，它形成于西汉武帝时期。

自庄子始把孔子的教材称为“六经”（见《庄子·天运篇》）。所谓“经”，本义指织布时的“经纬”之“经”，即指织布时的竖线。庄子及其之前，用以比喻其一思想派别纲领性的著作。如庄子把墨子的著作称为“墨经”。此后，随着封建文化思想的发展，为适应政治上的需要，就逐渐把“经”作为儒家重要古籍的专称了。在封建统治者看来，“经”就是“常道”，也就是永恒不灭、无所不在的真理。而那些解释和阐述“经”的著作，就成了与“经”相配的“纬”，成了后人学习、理解“经”的辅导性著作了。但是，纵观我国古代社会，“经”所包含的典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即使称为“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地位也有所不同。而原先的一些“纬”书，也有跃于“经”的地位的。

西汉武帝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董仲舒上书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符合汉武帝一统天下的意愿，得到了批准。于是，在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采取了具体措施，因《乐》已失传，朝廷设置了除《乐》之外的“五经博士”。汉朝设博士，并不始于武帝，汉文帝时已设立了《尚书》、《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等博士，景帝时又增置了《诗》、《公羊

春秋》博士。一是“博士”冠以“经”的名称，突出了“经”的地位；二是非“五经”不设博士，突出了儒学的地位；三是设置博士逐步制度化。这样，学者以经为学，通过当时的封建王朝按一定程序进行的考察，即可为学官，甚至由白衣而一跃成为卿相。于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史记·儒林传》）。受到秦始皇残酷打击的儒学，从此开始兴盛起来。自武帝始，一直到后汉，经学极盛，官府中儒生充斥。《汉书·马宫传赞》说：“自孝武兴学，公孙弘以儒相，其后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方进、孔光、平当、马宫及当子晏成咸以咸以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传先王王语，其藉可也。”

汉武帝企图划一学术、整肃思想的图谋，不仅表现在他处理儒家和“百家”的关系上，还表现在他处理儒家内部的思想派别上。据说，孔子死后，他精微要妙的话就失传了；他七十二个最得意的弟子死后，他所创造了基本理论就走了样。所以，到后代就出现了同一经典有不同的解释。例如，对《春秋》有五家不同的讲法，讲《诗》的有四家，讲《易》的则有更多的派别。

西汉末经王莽至东汉，虽然产生了激烈的经学史上的今、古文之争，进行过皇帝“亲称制临决”石渠阁、白虎观等会议统一经意的努力，经学科目有过种种变动，但都是“五经”内的调整及兼容，不过是容纳了“五经”中不同流派，称“经”的大目，却从不轻意向外扩张。

可以说，两汉时期，我封建社会前期的儒学经典体系说就已基本形成了。这是因为，第一，西汉的“五经”，《易》、《书》、《诗》、《礼》、《春秋》，是西汉推崇的最基本教材，也是后代最基本的教材；第二，儒家经典排列的先后次序基本定格，这就是《易》、《书》、《诗》、《礼》、《春秋》。这就是后人同时提到这几部经书时所采用的次第；第三，已形成了对这一体系内部结构有机联系的明确认识；第四，后代升格而称经的典籍，大多都包含在“五经”博士的细目中了。后世称为“十三经”的儒家经典，已经有九种被立为官学。这就是《易》、《书》、《诗》、《礼》（《周礼》、《礼记》、《仪礼》）、《春秋》（《公羊春秋》、《穀梁春秋》、《左氏春秋》），但仍以“五经”包容兼称。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不安，又以“九品中正制”取士曾一度造成经学衰微的局面。唐初经学的组织仍然遵循的是汉代的路子。唐高祖李渊即位后，即尊经学，兴教化，诏置州、县、乡学，立周公、孔子之庙于国学，亲事释奠之礼，规定学生凡通一经者，作为官吏。所以当时经学大兴，学生多至八千余人。但汉末至隋间所形成的经义纷纭、歧议多门的状况对唐初统一以及以经取士很不方便。为了统一思想，建立一个

划一的标准，于是诏国子祭酒孔颖达撰定五经义疏。孔颖达即组织人力，完成了《五经正义》、《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礼记正义》、《春秋正义》（或称《左传正义》）。《五经正义》把众说纷纭的经义统一起来。从此以后，都以它为标准明经取士，促成了经学史上的统一局面，“五经”的地位更加巩固了。值得注意的是，《五经正义》对“三礼”，只取了《礼记》；对《春秋》，只取了《左传》。在唐代，虽说《周礼》、《仪礼》、《公羊传》、《穀梁传》与前面的“五经”合称“九经”，并也是开科取士的科目，但显然不如有国家标准的“五经”重要。唐后期，文宗开成二年，以九经文字刻于石，立于长安国子监，称为“开成石经”。据宋人晁公武说，文宗太和年间，复制“十二经，立石学”。这样，《论语》、《孝经》、《尔雅》就被正式成为与《诗》、《书》等并列的经书了。

宋代是经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其思想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此产生了对经书的重新认识和体系的重建。

宋朝经学一反汉唐训诂义疏的传统，抛开传注，直接从经文中寻求义理。他们又以继承孔、孟道统自居，故称为“理学”或“道学”。其实政治理论的核心是“三纲五常”。理学体系形成于程颢和程颐，集大成者是朱熹。正是他们建构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儒家经典的体系——“四书五经”。

“五经”早已被推崇到不容怀疑的地位，“四书”却是理学家们的新结构。早在唐代的韩愈、李翱在反佛的斗争中，大力推荐《大学》、《中庸》和《孟子》，认为它们是与《易》等经书同样重要的经书。至宋，《孟子》被列入了经书的序列，与唐代的“十二经”并称“十三经”。但理学家们并不满足于这十三经的经书体系，他们要重新组织最能表达自己思想、最有效地适应当时政治需要的经书体系。

程颢和程颐汲取了经书体系在经书中的地位的经验，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地位，竭力推崇。他们把《大学》看成是人们入学的启蒙教科书，说：“《大学》，孔子之遗言也。学者由是而学，则不迷于入德之门也。”（《粹言》卷第一）他们借用《中庸》来阐发自己的学说，认为《中庸》讲的“诚”即是“天理”；“天理”即“诚”，并用它来沟通古今、上下、左右、主观和客观等等。针对北宋初期贬孟的议论，他们力争孟子的地位，认为“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孟子有大功于世”等等。因此，他们认为《大学》、《中庸》、《孟子》和其它的经书都同等重要，并预示为读于“六经”的阶梯。南宋“朝廷以其《大学》、《论语》、《孟子》、《中庸》训说立于官学。”（《宋史》卷429《朱熹传》）至此，《四书》不仅取得了自己存在的形式，并成了国家正式承认的与《五经》并列的儒家经典。

《四书五经大系》儒家经典体系的确立，是我国学术思想史上继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又一重大事件。如果说，此前的儒家经典及体系的建构目标，主要在于统治者禁锢知识阶层的思想，由此去影响整个社会，那么，《四书五经》的经典体系，却是着眼于直接去统一全社会的思想，打开经学的大门，去直接作用于社会每一个成员，直接去“正人心”，企图让每个人都“自觉地”用“三纲五常”去规范自己的言行，从根本上维护封建统治。这一经典体系的重点转移，说明了封建社会的危机在日益加深，同时也表明了《四书五经大系》的本质。

儒家经典对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发现起了重大影响。朱熹的《四书集注》，大部分成为了元、明、清三代的官书，多次印行，播及海外。学人以此作为猎取功名利禄的标准，百姓以此作为“修身养性”、“涵养功夫”的教条，对巩固封建统治，维护封建礼教起过重要作用，甚至今天还在影响着一些人的思想意识。因此，把它们用白话翻译出来，可以使更多的人知道自己思想意识的所以然，知道我们民族思想的所以然，以提高我们抛弃旧思想、接受新观念的自觉性。

在注解校核工作中，参阅了近几年出版的的各种的版本，借鉴和引用了有关版本的校点和长处。即使这样，由于勘校工作人员的水平所限，书中定会有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错误实所难免，求祈方家教正。

一九九八年十月八日

四 书

王介宏 / 注译

引 言

四书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部书。《大学》记述古代大学教人的方法，《中庸》讲述性命、中和的道理，《论语》记录孔子及其主要弟子的言行，《孟子》记载孟轲与其主要门弟子的言论。这四者合成一，并与五经（诗经、尚书、周易、礼、春秋）同列，成为一千多年来人们思想行为的钦定教科书。四书五经的形成有一个演进的过程。《大学》、《中庸》原为汉朝戴圣所传《礼记》四十九篇中的两篇，《礼记》从汉宣帝时起就列于学官（五经博士），它有东汉郑玄的注，唐代孔颖达的疏。《论语》在汉朝时就已经成为专门的学科，有专人传授，曹魏时期列于学官，何晏撰写过集解，梁皇侃撰写过疏（已佚，部分见于宋邢疏中）地位与经相等。惟独《孟子》虽然有东汉赵岐作过注，但自《汉书·艺文志》以下都将它列入子部，不与五经同科。赵岐《孟子注题辞》说：“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据《汉书·楚元王传》记载：文帝时闻申公为诗最精，以为博士。这说明汉文学是始一经博士。所以皮锡瑞《经学历史》说：“史记、汉书儒林传皆云帝好刑名，博士具官，未有进者。既云具官，岂复增置。五经未备，何及传记。恐非实录。”后来宋朝儒家学派尊崇孟子，才逐步与《孝经》、《论语》、《尔雅》并列，并用来考试士人，成为官学。

从四部书立于官学的先后看，《大学》、《中庸》因为《礼记》属经。所以在先，《论语》、《孟子》则是所谓传记之类。其实，《礼记》也是七十子后学所记，（见《汉书·艺文志》注及《隋书·经籍志》）《中庸》相传是孔子之孙子思所作，子思曾受学于曾参，《大学》虽不著作者姓名，既收在《礼记》中，当也是孔门后学所记。《论语》、《孟子》有先后，则可能因为孟轲关于“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君子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下）一类言论，被汉代以来的官学看成为战国策士言论，不得与参经典。唐代古文家韩愈倡道统，辟佛老，盛赞孟轲、辟杨墨以扶翼先王之道，孟子地位显著提高。他在《原道》中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他又在《送王秀才序》中说：“孟轲师子思，子思之学盖出曾子。自孔子没，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深受韩愈器重的李翱又将孟子性善论，与《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大学》正心诚意诸说，揉为一体，作《复性书》认为只要去掉情欲，回复本来的性，便能达到“至诚”的境界。韩、李之说，实际上为宋代理学

家提倡道统、心传开了先路，程颢、程颐、朱熹以倡导道学自任，更加表彰《大学》、《中庸》二篇，与《论语》《孟子》并列，认为这就是道学的所在。二程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均有阐说，一概以为理作为宗旨。朱熹撰写《大学》、《中庸》章句。《论语》、《孟子》集注，合称四子书。于是《大学》、《中庸》两篇遂从《礼记》中分离出来，独自成学。为了提高大学、中庸的地位，朱熹于《中庸》定著章节；而于《大学》既引程子言，说它是“孔氏之遗书”，又割裂原文，分为孔子经与曾参的传两部分，不免自我为法。朱熹所作四书集注，不徒有取于汉唐注疏，而且博采诸贤说解之长，无怪后来学者以为治经之阶梯，朱子死后，朝廷将他的四书训说立于学官，与五经并列。元仁宗延佑间(1314年—1320年)恢复科举、考试经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用朱子章句集注，历明清八股取士，沿袭不变，这恐怕也是朱熹始料所不及的。

四书所包含的内容极为广泛深湛，它涉及到中国古代思想、政治、经济、文化众多的方面，历代注家加以阐发宣场，特别到宋代二程朱熹给它系统化，形成一个以理为核心的思想体系，长期为封建伦理教化服务。其封建性的糟粕和所起的消极作用，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近七十年的不断批判，很多人已有所了解，无烦费词。至于对当前中国社会的现实及其发展还有什么积极意义。似乎缺乏共识，这就需要加以说明。

首先，书包含的博大内容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确对待文化传统，吸收积极因素，扬弃消极因素，是十分必要的。这一文化传统重视人生理想，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孟子·离娄下》），表现了先天下之忧的宏大心胸与高远见识。同时重视社会道德，“自古皆有死。民言信不立”（《论语·颜渊》），“人而无信，不知其何也”、“先行其言”（《论语·为政》），上下关系，相互交往，首重信用，力戒虚假。重视献身精神，“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舍生而取义”，（《孟子·告子上》）为国为民，虽赴汤蹈火，在所不惜。优秀的文化传统，浸润濡染，往往影响人们的素质，心理结构，风俗习尚，对整个民族起着凝聚力的作用。

其次，四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属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当时诸侯各国都想统一中国，谁能广泛延揽人才，富国强兵，谁就有强大的竞争力，机会是均等的，竞争是激烈的，文化思想是生机勃勃的，社会心态是健康向上的。人们主体意识强“匹夫不可夺志”（《论语·子罕》），“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孟子·离娄下》）浩然之气，“塞于天地之间”（《孟子·公孙丑上》）；由此激发出无穷的创造力“日日新，又日新”（《大学》）。这与秦以后历代王朝统治者利用这部分文化为封建伦理教化服务，并使之僵化停滞应不是一回事。

再其次,任何有生命力的文化思想,都决不会是封闭的、孤立的,环球广袤无分东西,地区国家无分大小,都可作为材料利用。1987年12月10日《参考消息》转载台湾《经济时报》文章说,“《四书》运用到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方面,将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世界管理大师彼德·杜拉克所推崇的日本“管理之父”涉泽荣一,早在明治维新初期,就在日本各地普遍开设“论语讲习所”,成功地创导了“论语主义”。1988年10月21日《参考消息》又载《日本企业家谈日企业经营方式中的儒家思想》文章:著名的企业经营者横山亮次(日立化成工业公司总经理)说:终身就业制和年功序列制(指按工作年限和成绩提级增薪)是“礼”的思想的体现,企业内工会是“和为贵”思想的体现。在同职工的关系上,他贯彻了“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等儒家思想。三菱综合研究所高级顾问中岛正树称“中庸之道”为最高道德标准。日立集团的创始人小平浪平把“和”、“诚”、“言行一致”列为“社(公司)训”。日本各企业内广泛开展的合理化建议运动和质量管理小组活动则是在最基层把“和为贵”和自由竞争完美地统一起来的良好形式。由此可见,我们是站在现代人的立场来吸取传统文化中一切有用的材料,关键在如何激活传统。恐惧复辟是多余的,为它唱挽歌是轻率的。

为了解除广大读者想读《四书》而又感到古文艰深的苦闷,张以文同志特地花几年功夫,采用直接对译的方法,用现代口语将该书逐字逐句全部译出。这对读者消除文字隔阂,节省阅读时间,并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从中吸取有益的材料,提高文化思想素养,从事当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都将大有裨益。但古文今译,有时也受到限制。如《论语·宪问》:“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己、为人是两种不同的治学态度,如果直接对译,易乖原义。朱熹《集注》引程子曰:“为己,欲得之于己也。为人,欲见知于人也。”译文要表达这个意思,不能不增字补足。有时遇到阙文,如《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集注》指出:“王肃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译文还得另添“反”字。因此,读者在基本读懂本书的基础上可以参考朱熹所作四书章句、集注,以便更准确了解原文的名物训诂和思想内容。如果有志研究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社会发展史、教育史和文学史等,那么前面叙述四书形成过程中,扼要提到的汉、魏、唐、宋人的部分注疏,并可参阅。

总目

第一卷

大 学	王介宏/注译
中 庸	王介宏/注译
论 语	王介宏/注译
孟 子	韩 路/注译
诗 经	张湘译/注译
四书五经启示录(一)	编校委员会

第二卷

周 易	李晓星/注译
礼 记	刘道彩/注译
四书五经启示录(二)	编校委员会

第三卷

左 传(上)	李世光/注译
--------	--------

第四卷

左 传(下)	李世光/注译
公羊传	李维奇/注译
穀梁传	李维奇/注译
尚 书	张东瑞/注译
孝 经	韩 路/注译

第五卷

周 礼	许宗义/注译
仪 礼	许宗义/注译
四书五经启示录(三)	编校委员会

目 录

引言	1
----------	---

大 学

大学	3
----------	---

中 庸

中庸	17
----------	----

论 语

第一篇·学而	41
第二篇·为政	46
第三篇·八佾	52
第四篇·里仁	59
第五篇·公冶长	64
第六篇·雍也	71
第七篇·述而	77
第八篇·泰伯	84
第九篇·子罕	89
第十篇·乡党	96
第十一篇·先进	102
第十二篇·颜渊	109
第十三篇·子路	115
第十四篇·宪问	122

第十五篇·卫灵公	132
第十六篇·季氏	138
第十七篇·阳货	143
第十八篇·微子	150
第十九篇·子张	154
第二十篇·尧曰	160

孟 子

第一篇·梁惠王(上)	165
第二篇·梁惠王(下)	177
第三篇·公孙丑(上)	193
第四篇·公孙丑(下)	208
第五篇·滕文公(上)	220
第六篇·滕文公(下)	232
第七篇·离娄(上)	244
第八篇·离娄(下)	257
第九篇·万章(上)	269
第十篇·万章(下)	281
第十一篇·告子(上)	293
第十二篇·告子(下)	307
第十三篇·尽心(上)	321
第十四篇·尽心(下)	335

大 学

王介宏/注译

